

中国民族的形成

李济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民族的形成

李济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

(国学书库·文史类丛)

ISBN 7-5343-7027-2

I. 中...

II. 李...

III. 民族—形成—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340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中国民族的形成

作 者 李 济

责任编辑 胡群英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页 2

字 数 205 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2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选人的话

这里选编的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开拓者李济先生的名著《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该书原文为英文,是李先生于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192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中译本由胡鸿保、张海洋等在1992年翻译,1996年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

以此篇为主,编选人还就此一主题增选了几篇重要论文和文献,现对编选工作作一说明。

书前收入了李济先生本人的两段文字,点明了他老年时期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发源初始的认识之发展;与此同时还列入了张光直先生关于李济作为一个“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的介绍文字。这两篇文字多少带有点导读性质。

1922年李济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带着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和另一篇介绍自己博士论文工程的文稿《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参加了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他的原意是想征求学术界对博士论文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与会的那些(北美的)人类学权威们虽然未必对李济整个博士论文的文字都感兴趣,但对李济用人类学手段探讨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却很关注,认为李济的报告(即那篇在1922年初发表的“学生论文”)是言之有物的。再加上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竟然大段引用李济在论文中关于汉语(象形文字)和

拼音文字的重要区别的论点,并加以正面评价,就使李济“一下子出了名”(费慰梅〔Wilma Fairbank〕语)。

上面这段话是想表明,编选人在介绍李济的博士论文时还需用一些篇幅介绍相关的重要文献和材料(请参看本书目录,其中李济的《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篇尤带有总结性质)。

李济先生是一代科学巨擘,知识渊博;我们作为他的后人,虽以先生为荣,但在学术上未得深窥堂奥,整理和编纂工作只能说是竭力而为,稍尽绵薄。如有失当错讹之处,尚希读者见宥,并望不吝赐正。

编选人 李光谟 李宁

李济关于中国民族及文化发展 的初始的几点看法

.....

.....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史，有时虽也免不了“鹬蚌灭裂”，但究竟是“旁观者清”，常能把我们自己认不出的问题，看得清楚些。.....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李济 1953年2月28日夜12时于台北
摘自《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之《后记》，见《李济考古
学论文选集》，962~96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

张光直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这里所说的“派”不是指党派，而只是“研究方式”或“研究方法体系”的简称。我觉得李济先生在中国古史研究上的方式和体系，用这个名词最能抓住它的精髓。

李济先生逝世已快十年了。这中间我常常回想起 1950—1951 学年即我做他的学生的头一年的情况，越来越能体会到在这一年中李先生对于作为一个如同白纸的新生的我，在为学基本方式上的深远的影响。一个刚刚离开中学的大学新生，对学问应该没有成见，如今接触到了这位名闻世界的老师，对他所代表的治学方式，自然会有一种很深切也很客观的印象和体会。在当时，这种印象和体会是不自觉的。到了三十八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这头一年的印象，才真正了解到李济先生为什么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是一个学派的开山祖师。这个学派也许可以叫它做“兼容并包派”或是“多学科并进派”，但还是以“人类学派”的称呼最为简单明了。

上面说到李先生“所代表的治学方式”，不仅包括李先生所说的，而且包括他所做的。这种治学方式固然有的是他课内课外讲授的，但大部分都是学生们得自李先生的一言一行，以及从他的著作中所“耳濡目染”的。大一新生上课多是必修课，如三

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只有“考古人类学导论”一课是李先生亲自讲授的。李先生头一次上课便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荀子·非相》的话：“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既然学人类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没想到这位闻名国际的大师竟开宗明义使用荀子的话来解释这门外国学问。（李先生进一步主张根据这一句话把“人”的拉丁学名 *Homo Sapiens* 翻译成“有辨的荷谟”。李先生这个译名，到目前为止未有第二个人采用，一般都译为“智人”。）他上人类学的第一课便告诉我们，要研究人类学，中西名词和中西观念都要融会贯通。因此不论是西洋玩意儿，还是中国固有文化，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都得采用。进一步说，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不论是哪种资料、哪种学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拿来使用。

李济先生一生追求的史学课题便是中国民族之起源。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李先生从他自己当学生的时代便开创了一条人类学的新路，就是多方面使用第一手的有关资料，用各种角度与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李先生在清华学堂毕业以后，1918年到美国留学，先在麻省的乌斯忒的克拉克大学念社会学与心理学，自1920年到1923年又在哈佛大学读人类学。在1920年前后，李先生写了一个很短的自传，讲述他求学的经过与志愿。这个自传现在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里面，1980年夏鼐先生特地抄录了一份给我。李先生当时对求学的想法见于最后一段，但全文不长，又有历史价值，就都照录在下面：

李济，湖北钟祥人，生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岁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念书。那时候，家里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理想。他们说，小孩子初念书的时候，要拣那顶难的给他

念,然后再给他容易的念,他的进步比平常就快多了。所以他发蒙的时候,不念“人之初”,却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四书念完了,继续的不是《诗经》却是《周礼》。但是他觉得他的进步不过同平常一样罢了。他那表叔,是一个老秀才,最喜欢打网棍,所以他现在虽说记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好处,却记得那头上发了几次块垒。

十岁的时候,他进了那县立的高等小学堂。初尝那新教育的滋味,就渐渐觉得那读书并不是很苦的事。

十一岁同他父亲到北京,在一个湖北省立的江汉学堂念了半年书,然后考进了琉璃厂厂甸的五城中学。清华学堂初开办的时候,在北京招生一百二十人,投考的有一千多。他也跑了去胡胡涂涂地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胡胡涂涂地取了。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可[也]是平平常常。要是把“中”字当“中样”讲,“庸”字当“碌”讲,他也总算是絮矩圣人之道的。

他初来美国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一九一九年在那一门混了一个 B. A. 后就跑到社会学里过去了,现在他又想研究人类学。

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这篇报告大概是现存的李先生所写的最早一篇文字(1991年

克拉克大学将所发现的李济先生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变化研究》的打印稿寄给了编者。这篇论文写于1920年上半年,应是现存的最早一篇文字了。——编者注)。从它看来,李先生对“中国人的原始”这个课题的研究方式,从一开始便是自多方面同时入手的——又要“量脑袋”,又要“刨坟掘墓”。1922年12月28日,李先生在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宣读了他的第一篇专业论文《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这篇文章以不完全相同的形式在两个刊物上发表,一个是巴尔的摩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第17卷第4期,325~329页,1922年;另外一个《哈佛研究生杂志》(*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第31卷,123号,346~351页,1923年。在前一篇文章里,李先生认为各种社会科学中以人类学最具潜力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的体系,因为“它包括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在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上,他特别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罗素在同年出版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s of China*)一书中特别引述。)

在后一篇论文即在《哈佛研究生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李先生简短地报告了两年来他在中国民族的形成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研究,说明他在这项研究上使用了五项不同的材料,即中国人人体测量数据、史书里有关城邑建造的资料、姓氏起源资料、人口资料,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这五种资料中,李先生分析出中国民族的五个源头,即黄帝子孙、通古斯人、孟—高棉人、掸人和藏缅人。但他在这篇报告里得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论:由这项研究可以看出人类学在中国史学上的前途是远大的。他指出,目前需要进行的人类学工作包括四项调查和研究,即考古调查、民族志的调查、人体测量学的调查,和中国语言的研究。在1923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这四门学科的科学 research 在中国都

几乎尚未开始。李济先生自他专业生命方才起步的时候便采取了研究中国古史各个学科兼行并进的方式。

在这里用李先生早年的三篇文字介绍他的“人类学派”的为学方式,是因为李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上和殷墟发掘上的巨大贡献多少把他对中国古史研究一般性的启发遮盖了,所以李先生对一般史学方法途径上的贡献是比较不为人注意,而又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最近李光谟先生与我一起编辑了一本《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不久会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编者后记》里,我“选了四个题目,对我认为是李济先生主要贡献之中的四个方面,就它们的历史背景稍加评论”。这四个方面是:

- (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人类学的途径;
- (二)现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初期发展方向;
- (三)殷墟发掘与中国古史;
- (四)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这四项里面,后面的三项是读者熟知的,不必在此辞费了。关于第一点,我上面指出是李先生专业生活起步阶段的特色,但自20年代以后半个世纪之内,一直也是李先生学术研究的指导方策。在60年代初期,李先生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时期,他曾发起编辑了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351~370页,1962年)一文里,李先生很有系统地说明了编辑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他说写这部书需用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材料;第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迹”;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

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由李济先生主持撰写的《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1972)对所用的资料的界说是：

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的资料，尤其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1本，4页，1972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这里应当加圈加点的一句话是：“一切有关的资料”。(这句话所代表的看法与上面引述的李先生在五十年之前的说法还是一样的！)作古史研究尽管要分成不同的学科，我们作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人还是要广要博，要使用一切有关资料，同时自然也要利用各个学科对这些资料研究的成果。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中间有研究考古学的，有研究古地史的，有研究民族学的，有研究先秦史的，这不过是在搜集资料、研究资料之上有所分工而已。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时候，李济先生便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身份，也就是以一个注重比较、兼顾各科的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出现了。

“比较”的对象，除了不同学科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与外国。《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里说：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从这个立场出发,《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对作者们有这样一条指示:“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褊狭的地域成见。”

这个看法,并不是个人胸襟的问题,而是代表在上古史资料研究上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李先生综述他对殷商时代中国文化来源问题的见解如下:

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在这些来源中,我认为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关系的。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 1200 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凭想像所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

这一段话表露了李济先生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他自己便从事了不少这一类“更深度的比较研究”;不论是在铜器的研究上,还是在陶器上,还是在艺术花纹上,他都指出过殷商与亚洲中部、西部同时期的古文明之间的若干类似性。他说:

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 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见《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期(1952)重印时加入的《后记》。)

李先生这种具体的主张是不是完全能够成立,还有这里的看法与上述以太平洋沿岸原始文化为殷商文明底层的见解有无摩擦,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面来研究的态度,却是李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学派古史观的一个重要部分。

(原载台北《历史月刊》第九期,1988年10月)

目 录

李济关于中国民族及文化发展的初始的几点看法	(1)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	张光直(2)

* * *

(一)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博士论文)	(1)
译者的话	(2)
前 言	(4)
第一章 难题所在	(7)
第二章 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	(12)
第三章 我群的演进:以城址衡量其规模	(81)
第四章 我群的演进:在研究姓氏来源基础上 对我群构成变化的评价	(164)
第五章 我群的迁徙: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	(247)
第六章 南方的你群	(257)
第七章 1644 年以前的三次北方大入侵	(282)
第八章 现代中国人的整合	(295)
附 录	(307)
附件一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节录)	(309)
附件二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313)
附件三 罗素与青年李济	李光谟(314)
附件四 李济致胡适的信	(318)
附件五 “三十余年前”的学生论文	李光谟(320)

附件六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323)
* * *	
(二)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329)
(三)中国人的种族历史	(344)

(一)中国民族的形成

——一次人类学的探索

(博士论文)

说 明

《中国民族的形成》是1923年著者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28年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是研究中国人类学的第一部著作。本书初稿的第二章曾由雷宝华据打字稿译成中文(题为《中国人种之构成》),于1925年发表于《科学》月刊第9卷第11期。1943年须山卓将本书译成日文全文发表于东京生活社(书名为《支那民族の形成》)。本书现全文译成中文发表。

此次特约请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及其他方面的几位专家学者参与本书的翻译工作,其中尤以张海洋博士、胡鸿保博士及林宗锦女士、李苏幸女士花费时间精力最大。全书最后经张、胡二位校订统稿,在此一并致以谢意。